

二语习得研究的三重转向

薛漓森

山东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

【摘要】：从神经语言学视角回顾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可以发现，近三十年来该领域经历了由“语言结构中心”转向“社会—认知—情感整合”的明显变革。本文在梳理相关代表性文献的基础上，概括二语习得研究中的社会转向、实证转向与情感转向，重点讨论三者的理论内涵、方法革新及其对教学研究的启示。文章认为，社会转向拓宽了二语习得的研究对象与情境边界，实证转向提升了研究的可验证性与解释精度，情感转向则推动研究从“是否学会”走向“如何在真实心理状态中学会”。神经语言学证据的进入，并未削弱传统二语研究的教育关怀，反而为课堂互动、任务设计与情绪支持提供了更具机制性的解释。

【关键词】：二语习得；神经语言学；社会转向；实证转向；情感转向

DOI:10.12417/2705-1358.26.07.069

二语习得研究并不是一条线性推进的知识史。早期研究更关注输入、规则习得与语言系统内部结构，随着社会语言学、心理语言学和认知神经科学不断进入这一领域，研究者开始重新理解“学习者”“情境”和“证据”的含义。二语习得不再被视为单纯的形式习得过程，而被看作发生在社会互动、认知加工与情绪体验交汇处的复杂活动^[1-4]。从这一意义上说，理论转向并不是旧理论被简单替换，而是研究视角与方法的持续扩容。

如果把近三十年的核心变化压缩为一条主线，可以概括为三个彼此关联的方向：其一是社会转向，即把互动、身份、共同体与多语生态置于更重要的位置；其二是实证转向，即强调以实验设计、过程性数据和神经认知证据提升研究的可检验性；其三是情感转向，即把情绪、焦虑、愉悦和动机从“外围变量”提升为解释二语学习成败的重要机制^[5-12]。下文将依次讨论这三种转向的意义及其启示。

把三重转向放在同一篇文章中讨论，是因为它们分别对应了二语习得研究中三个基本问题：语言学习发生在什么场域之中，研究者凭借什么证据来说明学习发生，以及学习者在这一过程中以何种心理状态参与其中。社会转向回答第一个问题，实证转向回应第二个问题，情感转向使第三个问题不可回避。若缺少社会维度，研究就容易把语言学习理解为脱离关系与身份的抽象加工；若缺少实证维度，许多判断又会停留在概念推论层面；若缺少情感维度，学习者的真实投入状态和持续发展机制便难以被解释。因此，三者并非简单并列，而是构成理解当代二语习得研究的解释框架。

从研究史看，这三种转向并非依次取代，而是对既有研究盲点的持续回应。早期结构主义或认知主义路径强调语言形

式、规则和输入条件，本身并非失效，而是在面对真实学习者差异、课堂互动复杂性以及在线加工证据时显得解释不足。正因为如此，后续研究才不断把社会维度、过程维度和情绪维度纳入同一框架。对今天的二语研究而言，真正重要的问题已不是“应当坚持哪一种单一理论”，而是如何在具体研究中说明：某一结论究竟是在什么情境、面对什么对象、借助什么方法得出的，以及它可以在多大范围内被推广。

1 社会转向：从“输入中心”到“互动—生态中心”

社会转向首先改变了二语习得研究对“环境”的理解。Long 强调可理解输入与互动协商的重要性，Firth 和 Wagner 则进一步指出，二语使用者并不是等待规则灌输的被动接受者，而是在真实交际中不断协商意义、身份与关系的行动者^[1-2]。Block 提出“社会转向”后，二语习得研究开始更明确地吸收社会文化理论、身份研究与话语研究成果，把课堂、社群与多语生活世界纳入解释框架^[3]。

从神经语言学视角看，社会转向的价值在于它为“互动为何有效”提供了更细的机制解释。语言学习并不只依赖词汇和句法的重复暴露，还依赖共同注意、反馈调节、预测加工以及情境中的意义建构。有关“语言社会脑”的研究表明，社会情境会影响学习者对输入的注意分配、记忆巩固和语义整合，因此互动并不是教学的装饰性环节，而是塑造加工效率的重要条件^[7-8]。

也就是说，社会转向并不是对语言结构研究的否定，而是要求研究者把结构加工放回互动过程之中加以理解。只有当语言形式、交际目的与社会关系同时进入分析视野时，二语习得研究才能更完整地说明学习何以发生。课堂中的任务设计不应

只强调答案正确与否,而应重视协商空间、角色关系与真实用途。与其把语言材料处理为孤立句子,不如将其放回交际事件、同伴合作和多模态支持之中。社会转向真正改变的是研究者对“学习场景”的理解:语言不是先在头脑中完成,再被拿去使用;相反,许多可持续的学习恰恰是在使用之中生成的^[4]。社会转向还促使研究者重新思考“能力”的定义。传统意义上的语言能力往往被理解为个体头脑中的规则储备,而社会文化取向更强调能力是在参与、调节与协作中被不断实现出来的。学习者能否在真实情境中调用语言资源,不仅取决于其掌握了多少词汇和句法知识,还取决于其是否能够理解他人意图、回应反馈、适应身份关系并在互动中持续维持意义协商。正是在这一层面上,社会转向把“会不会”转化为“能否在具体情境中有效行动”的问题,从而使二语研究更接近真实语言生活。

2 实证转向:从理论争鸣到证据累积

实证转向意味着二语习得研究越来越重视“如何证明”。与早期较多依赖理论推演和课堂观察相比,近年来研究开始广泛使用自定步速阅读、眼动追踪、行为反应时、ERP、fMRI等手段来描写语言加工过程^[5-8]。这一变化并不只是技术升级,更重要的是它推动研究者把宏大理论拆解为可操作、可检验的问题,例如学习者在某一时刻完成语义整合、在何种任务条件下出现加工迟滞、情境变量如何改变注意分配。如果进一步细看当前二语研究的发展,可以发现实证转向并不只发生在实验室技术层面,也发生在数据观念层面。越来越多研究不再满足于单次后测或总体均值比较,而是尝试通过纵向追踪、混合方法设计、多指标联合分析来描写学习过程本身。这种变化意味着研究开始重视“过程证据”而不是仅仅依赖“结果证据”。对于受任务、个体、语境共同影响的二语习得而言,过程性数据尤其重要,因为很多教学现象正是在时间推进、策略调整和反馈循环中逐步显现出来的。

实证转向也改变了二语研究的证据结构。过去很多争论停留在“谁的理论更有解释力”,而现在更强调不同证据之间的互相印证:行为数据揭示结果差异,在线过程数据呈现加工轨迹,神经指标补充时间进程与资源调配的信息^[5-6]。这使得二语习得研究逐渐从单一结论导向转向机制解释导向。换言之,研究关注的不再只是学习者学得好不好,还包括为什么在某个任务中表现更好、哪一类信息先被激活、哪些条件会改变加工路径。当然,实证转向也带来新的要求。实验设计越精细,研究者越需要警惕生态效度不足、任务人为化以及样本代表性有限等问题。真正有价值的实证研究,不是把课堂问题机械搬进实验室,而是让实验方法与教育问题彼此校正。因此,未来的二语研究需要继续推动“实验室证据—课堂解释—教学应用”的循环,而不是让方法本身取代问题意识^[5-6]。如果研究问题本身界定含混,或变量之间的理论关系没有被清楚说明,再复杂的技术手

段也只能得到碎片化结果。实证转向真正值得肯定之处,在于它迫使研究者把问题意识、研究设计与证据解释放在同一逻辑链条中审视。与此同时,实证转向还改变了学术共同体评价研究质量的标准。过去一项研究往往只要提出较完整的理论解释即可获得关注,而现在研究者更强调材料控制是否严格、任务设置是否透明、统计报告是否充分、结果能否在其他样本和语境中复现。尤其在神经语言学和实验心理语言学进入二语领域之后,研究设计中的细小差异都可能影响结论方向,这要求研究者在报告研究时不仅给出“发现了什么”,更要交代“这一发现是在何种限制条件下成立的”。这种方法意识的提升,对整个二语习得学科的成熟具有基础性意义。

3 情感转向:从附属因素到核心机制

从更广的理论背景看,情感转向也与近年来教育神经科学和积极心理学的发展互相呼应。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,学习不是冷启动的符号运算,而总是伴随着价值判断、动机指向和身体感受。学习者是否愿意持续接触目标语、是否在出错后继续尝试、是否把课堂经验解释为威胁还是挑战,这些看似“软性”的因素都会转化为注意维持、策略选择和记忆巩固上的差异。正因为如此,情感研究的意义并不局限于解释课堂氛围,而在于揭示语言学习如何真正成为一种带有主体体验的认知活动。情感转向的核心在于,情绪不再被视为影响学习的外在噪音,而被视为语言加工的一部分。Dewaele与MacIntyre关于外语愉悦与课堂焦虑的研究表明,积极情绪与消极情绪并非同一连续体的两端,而是可以并存并共同影响学习投入与课堂表现^[9]。这意味着二语课堂不能只关注知识输入量,还必须关注学习者在输入过程中的心理状态。神经语言学和双语词汇研究进一步说明,情绪会影响注意捕获、语义整合和记忆保持。带有情绪效价的词语往往比中性词更容易引发深层加工;在双语条件下,词汇具体性、任务类型与语言状态还会进一步调节这种情绪优势^[10-11]。因此,情感转向并不是把课堂“软化”为情绪抚慰,而是强调情绪本身就是加工资源配置的一部分。

从教学上看,情感转向至少提出两点要求。其一,课堂设计要在挑战与可控之间保持平衡,避免持续高压导致工作记忆资源被焦虑占用;其二,教学材料应适度增强情境性、情绪可感性与个体关联度,以促进更深层的语义加工。就这一点而言,情感转向与社会转向、实证转向并不冲突:真实互动提供情绪载体,实证方法帮助识别情绪变量的作用机制,而课堂干预则把这些发现转化为可操作的教学策略^[9-11]。还需要指出的是,情感转向之所以具有解释力,并不只是因为它把“情绪”引入研究,而是因为它改变了研究者理解学习者个体差异的方式。过去不少研究把焦虑、动机、自信等变量视为相对静态的背景因素,而新的研究更强调它们具有情境生成性和动态波动性:同一个学习者在不同课堂任务、不同反馈方式、不同同伴关系

中,其情绪状态及其对加工资源的占用程度都可能不同。由此可见,情感并不是附着在学习过程之外的主观体验,而是与输入处理、意义建构和表达意愿同时展开的心理过程。就中国外语教育语境而言,这种整合视角尤其具有现实价值。长期以来,课堂研究有时容易在“知识讲授”与“活动组织”之间摇摆:前者强调语言点覆盖,后者强调形式上的互动热闹,却未必总能解释学习为何发生、又为何中断。三重转向提供的启示是,教学设计不能只看表面的任务安排,而要同时考虑互动关系是否真实、证据收集是否充分、情绪支持是否到位。只有这样,研究结论才可能真正反馈到教材处理、课堂组织与学习者发展评价之中。回到二语习得研究的发展脉络可以看到,社会转向、实证转向与情感转向并不是彼此割裂的三条路径,而是共同推动该领域走向综合化与机制化的三个支点。社会转向重新定义了语言学习发生的场域,实证转向提升了研究的可验证性,情

感转向则使研究更贴近真实学习者的心理经验。神经语言学的意义并不在于用高技术替代教育研究,而在于帮助我们更清楚地说明:互动为什么重要,证据如何累积,情绪为何影响学习。对于今后的二语教学与研究而言,更值得追求的不是单一理论的“胜出”,而是在社会情境、加工机制与课堂实践之间建立能够相互解释、相互支撑的研究框架^[4-11]。因此,三重转向最终指向的是一种更具整合性的研究观。未来的二语习得研究既不能停留在抽象理论之间的概念争鸣,也不能满足于技术手段本身的展示,而应进一步思考不同层面的证据如何共同服务于教育问题的解释。对于教育研究者而言,这意味着在关注课堂成效时,需要同时看到学习活动所嵌入的社会关系、学习表现背后的加工机制,以及情绪体验对持续参与的调节作用。只有把这三个维度真正联结起来,二语习得研究才能既保持理论深度,又维持面向课堂实践的现实解释力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Long MH. The role of the linguistic environment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[A]. In: Ritchie WC, Bhatia TK, eds. Handbook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[C]. San Diego: Academic Press, 1996:413-468.
- [2] Firth A, Wagner J. On discourse, communication, and (some) fundamental concepts in SLA research[J]. Modern Language Journal, 1997, 81(3):285-300.
- [3] Block D. The Social Turn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[M]. Washington, DC: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, 2003.
- [4] Douglas Fir Group. A transdisciplinary framework for SLA in a multilingual world[J]. Modern Language Journal, 2016, 100(S1):19-47.
- [5] Marsden E, Thompson S, Plonsky L. A methodological synthesis of self-paced reading in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[J]. Applied Psycholinguistics, 2018, 39(5):861-904.
- [6] Godfroid A. Eye Tracking in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Bilingualism: A Research Synthesis and Methodological Guide[M]. New York: Routledge, 2020.
- [7] Li P, Jeong H. The social brain of language: grounding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in social interaction[J]. npj Science of Learning, 2020, 5(1):8.
- [8] Jeong H, Li P, Suzuki W, et al. Neural mechanisms of language learning from social contexts[J]. Brain and Language, 2021, 212:104874.
- [9] Dewaele JM, MacIntyre PD. The two faces of Janus? Anxiety and enjoyment in the foreign language classroom[J]. Studies in Second Language Learning and Teaching, 2014, 4(2):237-274.
- [10] Citron FMM, Gray MA, Critchley HD, et al. Emotional valence and arousal affect reading in an interactive way: Neuroimaging evidence for an approach-withdrawal framework[J]. Neuropsychologia, 2014, 56:79-89.
- [11] Ferré P, Anglada-Tort M, Guasch M. Processing of emotional words in bilinguals: Testing the effects of word concreteness, task type and language status[J]. Second Language Research, 2018, 34(3):371-394.
- [12] Dörnyei Z. The Psychology of Second Language Acquisition[M]. Oxford: Oxford University Press, 2009.